

人文叢書
傳記類

永遠的園外人

——冷若水回憶錄

冷若水 / 著

三民書局

叢書
傳記類

永遠的 國外人

——冷若水回憶錄

冷若水 /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永遠的圈外人：冷若水回憶錄／冷若水著．——初版一
刷．——臺北市：三民，2016

面；公分．——(人文叢書.傳記類5)

ISBN 978-957-14-6089-5 (平裝)

1. 冷若水 2. 回憶錄

783.3886

104022783

◎ 永遠的圈外人

——冷若水回憶錄

著 作 人 冷若水
責任編輯 郭雅禎
美術設計 巫佳穎

發 行 人 劉振強
發 行 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 市 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16年1月

編 號 S 78255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6089-5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謹以此書獻給
維護中華民國權益的
外交鬥士



代 序

思親憶舊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凌晨，我在匈牙利布達佩斯接到妹妹若雪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爸爸情況不好，他正趕到醫院去，有進一步消息會立即跟我聯絡，過了一會，又來電話說，爸爸已經走了，但走得很平靜，沒有什麼痛苦。

父親過世，應該是很哀痛的事，但我此時的第一個感覺並不是哀傷，而是感謝。因為自從八月間父親住院，我從匈牙利趕回臺北到醫院去探視他，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接著許多管子，聽過醫生的診斷說明後，我就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臨，只希望父親在走以前不要受太多的痛苦。

父親的身體始終算不上是健壯，據他自己說，他不但是祖父的獨子，因為伯祖父無子，也將他過繼過去，變成一人雙挑，自然從小就受到兩家的疼愛，養在家裡，不准隨便外出，以防得病。結果是正好相反。照顧得太周到使得他變得弱不禁風。父親說，他有一次自己想偷偷地從家裡出去玩，因為從來沒有自己一個人出去過，自然感到膽怯，在家前面的巷子裡，走了一半，就嚇得不敢再走了，立刻跑回家，當晚就生了場病。

我從小對父親的印象就是他身體不好。常聽到母親說，我幼年時，父親因為支氣管破裂吐血，在床上躺了三個月不能動，飲食都需要別人伺候，否則就會吐血。這一段事我沒有記憶，但是記得民國五十一年間，我在軍中服預備軍官役時，有一天得到家裡的緊急通知，父親因為

胃病吐血住院，要我請假趕回去探視。回去後知道情況很嚴重，而且禍不單行。他在家裡突然吐了一臉盆的血，母親立即把平時經常為父親看病的空軍總醫院內科主任戴文鑫醫師請來，戴醫師一看父親的情況就說立刻送醫院，母親叫了部計程車，把父親扶上後座，自己坐在旁邊，請戴醫師坐在前座，計程車駕駛看到父親的情況，自然加速急駛，在圓山美軍俱樂部前面遇到一名醉酒駕車的美軍，逆向行駛，兩車相撞，幸好計程車駕駛反應得快，只有戴醫師膝蓋受到擦傷。大家立即另外叫了部計程車趕到空軍總醫院去。

父親的胃出血是由胃潰瘍引起的，而他的胃潰瘍則是長年新聞工作帶給他的職業病。這一點我在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後也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全家於民國三十八年從上海移居臺灣後，父親就到《中華日報》擔任編輯，每天晚上上班，到快天亮時才回家，上午睡覺，中午以後起床，這樣日夜顛倒的生活，對胃傷害最大。記得有一次臺北新聞界朋友聚餐，為王洪鈞先生赴美留學送行，父親也參加，席間大家相互敬酒，父親說他不會喝酒，但有人說大家都喝，你不能不喝，就在他的汽水裡加了一點酒，父親喝了以後竟然暈倒，大家趕快把他送醫院急救。經過這次事件後，父親不會喝酒的名聲傳遍了臺北新聞圈。事實上，當時父親並不是因為不勝酒力醉倒，而是酒精刺激胃潰瘍，胃部充血導致腦暈所致。後來父親在《中華日報》的職務由副總編輯調為主筆，不再需要熬夜上班，改為撰寫社論，胃病就逐漸康復。有時在家用餐時竟然能用湯匙盛點白蘭地佐餐，可見他並不是一點酒量也沒有。不過，臺北新聞圈流傳他喝一滴酒就醉倒的故事，不但成為他在宴席上不參加拼酒的擋箭牌，也讓以後我在新聞界聚餐時以此藉口推辭了朋友的勸酒。

父親自從離開《中華日報》的編輯臺，不再熬夜以後，健康明顯改善，但民國七十四年初突然覺得心臟不舒服，醫生檢查發現是幾十年吸煙的結果，導致肺氣腫，壓迫心臟。他一方面決心戒煙，同時經友人介

紹到一位曾良時先生那裡去接受腳底按摩治療。居然把他的肺氣腫治好了。這段過程，他曾在《中央日報》副刊以「久病知良醫」為題寫了篇文章，他後來還把這篇文章編入了他的自選集。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他有一天與母親一同到曾先生那裡去做腳底按摩，在南京西路過馬路時突然暈倒，送到醫院急救檢查，發現是身體內部出血，血壓降低所致，再仔細檢查，發現是大腸出血。醫生動手術把出血部分的大腸切下來檢驗，查出有癌細胞，醫生診斷是大腸腺癌第三期，但並未擴散。醫生因為父親失血太多，身體虛弱，建議先把身體調養恢復體力後再作抗癌的治療。我那年還在美國華盛頓擔任中央社分社主任，知道父親住院，但情況並不緊急，等到八月返國述職時，才回家探視。

依照醫生的診斷，父親在恢復體力後可以回家療養，但應該接受化學治療。我回到臺北看到父親的情況，想到化學治療雖可以阻止癌細胞的再生，但也有副作用，尤其影響食慾，而父親已經七十五歲，以他從小就多病，成年後又發生幾次重病的經歷來說，已經不容易了。他自己曾說過，算命的說他只能活到五十七歲，他不但早已過了五十七歲，把五十七倒過來算的七十五歲生日他也度過了。這時再來受化學治療的痛苦，是否值得。而且年老人生命力較弱，癌細胞再生得也比較慢，醫生在他切下來的大腸中只找出一個癌細胞，表示父親的癌症只是剛開始，並無立即生命危險。我就建議他不接受化學治療。

父親接受了我的建議，在母親的細心照顧下體力逐漸恢復，民國八十年國慶，我隨華盛頓的幾位新聞同業應華府華語電視的安排回國參加慶典，歐陽冠玉先生主持的《新聞鏡周刊》特別為我們幾位舉辦了一次座談會，父親還前來參加，最近翻出當時所拍的相片，看得出他雖然消瘦些，但精神很好，不像是患癌症的人。民國八十一年七月，我從中央社退休，回到臺北參加外交部工作，與父母住在一起，並於次年為他們

舉行八十大壽雙慶，父親都顯得健康快樂。雖然走路需要拿手杖，但並不是因為體弱，而是因為眼睛白內障，只開刀矯正了一個，所戴眼鏡的鏡片一邊是平光，另一邊是深度近視，走路時看出去會覺得路面高低不平，拿根手杖，是為了預防失去平衡跌倒。民國八十五年七月我奉調到匈牙利工作，至八十七年底屆滿兩年，依規定返國述職，很高興看到父親的健康情形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他也對自己能在發現癌症後維持正常生活幾乎十年感到自傲。就連當初為他開刀的醫生都嘖嘖稱奇。

但一年以後，父親再度因為身體不適住進三軍總醫院，這一次醫生發現父親的癌症復發了，而且比十年前嚴重。在醫院動手術切除，療養幾星期後回家休息，只是加請了一位特別看護，日夜照顧。我因公不能回家探視，只能在電話中問候，聽到父親說起話來中氣仍然很足，還覺放心。父親說，明年有總統選舉，他一定要再投一次票。第二年三月，我依總統選舉海外國人投票辦法返國投票，也探視父親，這一次發現他的健康衰退了，但是仍然能自己上下樓梯，也能走到後面巷子的餐廳進餐。三月十八日一早，他坐著輪椅，由里長推著到和平東路上的師院附小去投票，現在回想，這是他最後一次行使公民投票權。

父親的癌症復發，顯然比第一次嚴重很多。他在臺北的家是所謂樓中樓，客廳在二樓，臥房在三樓，他每天早上由三樓走到二樓，白天都在二樓活動，晚上看過電視新聞後再回到三樓休息。我回到匈牙利任所後不久，傳來消息，父親有一天早上由三樓到二樓時，走到一半突然腿軟坐在樓梯階上，後來由母親扶著才走下來，自此以後，父親就不再到三樓，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二樓客廳，而且除了吃飯、讀報及看電視新聞外，一直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閉著眼睛休息。我從匈牙利打電話回臺北問候，他只說還好，其他的話不願多說。但有一次，他問我今年春節是否可以回臺北陪他過年，我突然感受到他言外之意，告訴他我會想辦法回去。民國九十年元月中旬我返國述職，辦完公務後，利用政府機關放

假的幾天在家裡陪父母，跟他們共進年夜飯，還奉父親的指示邀約了幾位他的親近朋友到敘香園去吃了一頓。這一次，我發現父親健康又衰退了一些，但是精神還很好。

父親此時應該已經感覺到他的病況嚴重，約了一個時間與我單獨談話，說到他年輕時期的辛苦，對於能活這麼久表示已經很滿意，只是不放心母親。我對他說，我們一定會照顧母親，請他不要擔憂。他聽了我的話，表示這樣他就放心了。接著說，今年他的生日，按日本算法是米壽，本來中國人不把米壽當作大壽，而是慶祝滿十的整壽，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九十歲，想慶祝米壽，問我到時能不能回臺北為他慶祝。我說一定回來。

父親的米壽日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我與金琰於二十日回到臺北。第二天在仁愛路的上海鄉村餐廳為父親舉行壽宴，邀請了他的好友，以及他在淡江大學教過而至今仍經常來探視他的學生，一共兩桌。我們安排了海鮮席，都是些父親喜歡吃的菜，但是他此時牙齒掉得只剩下一顆，只能吃麵包和蒸的銀絲捲，以及喝點湯。他最喜歡吃的海參，他含在嘴裡裹了一下，最後吐了出來。我看在眼裡，感到心酸。但是他挺起精神，從頭坐到尾，不像平時在家裡坐了半小時就要睡覺，顯然他心裡很高興。

他此時的健康，比農曆春節時又衰弱了一些，但是生活起居仍然能自己處理，出門時也能在別人攙扶下從二樓下樓，走到巷口上計程車。對他最不方便的是聽力嚴重衰退，我們要跟他說話必須靠近他耳朵講，他才聽得見，因此他在壽宴上只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大家吃，不但自己不能吃，也不能跟大家聊天。此時我突然感到父親已失去了生活的樂趣。他平生最喜歡四件事，就是吃他喜歡的菜，與朋友或學生聊天，打麻將，及跳舞。最後一件因為記者之家的衰落以及臺北舞廳風氣的敗壞，他早已停止。麻將他前幾年還請少數朋友來陪他打，但是每次結束

以後就當晚失眠，因為用腦過度，事後躺在床上閉眼睛，腦子裡全是麻將牌，此後就少打了。現在他因聽力衰退，牙齒脫落，連聊天與吃飯都很吃力了。看到他的情況，我不得不為他感到難過。

九十年八月中旬，我在匈牙利接到母親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父親的下巴前幾天突然脫落，嘴閉不起來，不能吃東西，送到臺大醫院急救，醫生替他注射了一針鬆弛肌肉的藥，才使他的嘴能閉起來，但是回家以後一直發燒，昏迷不醒，母親很擔心，我建議他立刻把父親送醫院，母親為不知該送哪家醫院煩惱，因為父親以前幾次住院都是到三軍總醫院，那裡的醫生對父親的病歷比較熟悉，當時三總的院址在汀州路，距離和平東路的住家不遠，但是此時三總已搬到內湖，交通不方便，尤其是，每次父親住院，母親一定陪同住院，但每天會找個時間回家洗澡換衣服，如果醫院太遠，對母親就很不方便。

八月二十二日，妹夫之昂發來傳真說，父親住進位於木柵的萬芳醫院，經醫生檢查發現是肺炎，已送進加護病房。我獲得這個消息後，立刻感到事態嚴重，因為父親年老體弱，癌細胞的擴散應該比較慢，對他的健康不會有立即威脅，但是老年人得肺炎，就比較麻煩，許多老年人都因此不治。我立刻向外交部請假趕回臺北探視，八月二十六日下午抵達臺北，回到家裡看到母親在等我，對我說醫院規定，加護病房病人的家屬不能在旁陪侍，每天只有上午十時半和晚上七時兩個時段可以進去探視，每次四十分鐘。但是為了讓我能在返回臺北後立刻去探視父親，他已洽請醫院特別同意讓我今天下午隨時去。我聽到後就立即跟母親坐計程車趕到醫院，加護病房的護士也依約特別開門讓我進去。我看到父親躺在病床上，鼻子上接著管子，眼睛閉著在休息。護士對著他的耳朵說，「爺爺，你兒子回來看你了。」父親睜開眼睛看到我，對我說：「你回來了呀。」我叫了聲爸爸，問他好不好，他點了點頭，再問我會停留多久，我說外交部准我一個星期的假。護士在旁說：「爺爺知道今天兒



子要回來很興奮，還特別刮了鬍子。」我問護士父親的情況，護士說還在發燒，醫生仍在用抗生素，希望把他的體溫降下來。除此以外，情況還算好，胃口尤其好，時常晚上叫肚子餓要吃東西。

以後幾天，每天上午及晚上，我都在醫院規定的家屬探視時間到醫院去與母親一同探視父親，他每次都問我們現在幾點鐘，我們告訴他後，他就閉起眼睛不再說話。後來才知道因為父親每天白天睡覺，晚上醒來要吃東西，護士嫌麻煩，就把白天說成晚上，晚上說是白天，想用這個方式讓父親改為晚上睡覺。但是父親從我們那裡知道了正確的時間，了解到護士在欺騙他，心裡很生氣。有一次就對我們說護士欺負他，用冷水替他擦身體，讓他冷得發抖，「我怎麼能不發燒？」他要我們把他搬出加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去。我們對他說，在醫院裡一切都要聽醫生的，讓我們先問問醫生的意見。（其實護士並沒有用冷水替他擦澡，只是水溫不如他在家裡時母親給他用的那麼熱，讓他覺得是冷水。）

我們找到主治的醫生，告訴他父親的要求，問他的意見，醫生說父親的體溫仍然偏高，必須要繼續檢查，了解除了肺部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部位發炎，然後再決定是否可以轉到普通病房。我問醫生父親的癌症情況，他說已擴散到肝和肺，但是現在還沒有發作，父親還不會感覺痛苦。我對醫生說，父親年事已高，得的又是癌症，我們都對他的康復不抱太大的期望，只希望他少受點痛苦就好，醫生表示了解。

母親本來不贊成讓父親搬到普通病房，因為覺得加護病房照顧得比較仔細，他比較放心。我和若雪都勸他說，父親病得這樣，要想他康復是不可能的，現在他住在加護病房心裡不高興，我們做兒女的心裡不忍，現在他希望什麼，只要能做得到，就儘量隨他的意了。母親想了一下說，只要在普通病房也能獲得充分的照顧，就搬吧。

我們雖然獲得母親的同意，但是醫生仍然要等到檢查結果出來後才能決定是否可以搬。父親顯然等得不耐煩了，有一次探病時間我去看

他，他見到我只說了一句：「你只會辦外交，不會辦內交。」他雖然沒有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我心裡明白，父親在責怪我不能說服醫院讓他搬到普通病房。我就轉過頭去對護士說，請你們跟醫師說，除非我父親的情況非住加護病房不可，否則請儘快安排他轉到普通病房。

第二天上午我們到加護病房去探視父親時，護士對我們說，檢查的結果出來了，醫生決定讓你父親當天下午搬到普通病房去。我因為當天下午需要到外交部去辦點事，父親搬病房的時候我不在醫院，據事後妹妹告訴我，搬房時父親正在休息，突然間醒來發現有人在推動他的病床，就問道：「你們要把我搬到哪裡去？」若雪說：「要搬到普通病房去。」他又問：「怎麼可以搬了呢？」若雪答：「因為你罵哥哥只會辦外交，不會辦內交。」父親聽後就不再追問了。

父親的病況很嚴重，但是看起來還算穩定，一時不會立即惡化，按理我應該留在臺北陪他，但是公務在身，不能離開任所太久，只能決定先回匈牙利，讓母親和若雪照顧他，等到最後情況緊急時再趕回來，只是我也與若雪約好，如果萬一父親支持不住，也不必為了等我而用藥物維持他的生命而延續他的痛苦。父親年紀這麼大了，又患癌症，我們做兒女的只求他少受點痛苦。

對於父親，我們能做的已有限，這時急需做的是給母親做心理建設，讓他有心理準備，以減少父親不治時對他的心理打擊。我們不斷地對母親說，父親的病已不可能治好，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少受點痛苦。母親到底是通理的人，也了解事情未來的發展，很平靜地接受了我們的勸說。當我趁還在臺北的期間和若雪去找葬儀社預先籌備後事時，母親還能提供意見。大家同意，父親過世後不寄發訃聞，只在《中央日報》上登廣告，因為寄發訃聞需要擬一個名單，此時我們都定不下心來擬這個名單，而且究竟應該發給誰也很難決定，無論寄多寄少都不妥當，不是被人批評為打擾，就是被認為看不起，而且要找朋友的通訊地

址也很費事，但為顧慮許多朋友看不到《中央日報》，我們計劃再請中央社發個新聞。另外，我們也先準備好父親的事略，到時分送給親友，為此，我拜託父親的多年好友周培敬老伯執筆，周伯伯一口答應，並且當天晚上就趕寫出來，我把這篇文章交給若雪收藏備用。

我預訂八月二十五日離開臺北返回任所，起飛時間是晚上，當天下午到醫院去想跟父親道別，大家心裡都了解這是生離死別，我們父子二人再相見的可能性很低。我到醫院時，父親閉著眼睛在休息，我守在旁邊，想等他醒來時跟他道別，但是他一直不張開眼睛，母親看到我在等，就對著父親的耳朵說：「爺爺，兒子要回匈牙利去了，要跟你說再見。」父親張開眼睛，對我望了一眼，還沒有等到我叫爸爸，就又閉上了。我立即說：「爸爸，我要回去了，請你好好休養。」但他沒有回答。我心裡感到父親在生我的氣，責怪我不留在臺北陪他。但是我實在因公必須趕回任所處理，只好忠孝難兩全了。母親在旁看到這個情形，對我說：「你就走吧。」

我於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匈牙利，心裡準備隨時接到若雪的電話趕回臺北。但是因為在九月上中旬我在任所有幾件公事約會不能更改，十月上旬又須籌辦國慶酒會，因此我在離開臺北前就先與若雪約好，如果父親的情況在未來一兩星期內有變化，我訂九月下旬回來，如果一時沒有變化，我在辦完國慶酒會後再回臺北。

誰知在我返回匈牙利後不久，發生了九一一紐約世貿中心被炸事件，外交部為因應這件國際重大事件，指示駐外館處停止休假，館長更是除公務外不能離開任所。接到這個指示，我知道不可能再請休假回臺北探視病中的父親，只好在匈牙利等候消息。從八月底起，我每天打電話到萬芳醫院詢問父親的病情，母親告訴我還算穩定，父親大多數時間都閉著眼睛休息。有一天他突然醒來說要看報，看護把醫院提供的《自由時報》給他，他看了一下說：「這不是《中央日報》，我要看《中央日

報》。」母親立即請人去臨時買一份《中央日報》給他看。

十月上旬，若雪在電話中對我說，父親的癌症發作了，他開始感覺疼痛，可以聽到他在呻吟，妹妹說他看到父親如此受苦受罪，十分不捨。他認為醫生們的一切醫療措施都僅及於肺炎部分，但對肝腫瘤日益擴大的問題沒有幫助，做兒女的實在不忍心眼睜睜等到父親最後肝爆破引起口吐鮮血的痛苦慘狀，因此想請醫生停止所有醫療，讓父親早點超脫，我同意了妹妹的想法。但第二天父親的病情仍然維持原狀。此時，醫院通知母親說，父親住院已將滿兩個月，依健保局的規定，住院不能超過兩個月，因此要我們準備出院，母親說，如果健保只能付兩個月住院費，超過兩個月的費用我們自己付，請醫院讓父親繼續住下去。醫院說，依健保規定，凡接受健保付費的醫院，不能接受病人自費。這個規定顯然是為了預防醫院在收取健保費後又向病人另外收費，但卻為我們製造了問題。我們面對兩個選擇：把父親接回家，或者轉到不接受健保的醫院。我知道中信集團經營的和信醫院是專為這種情形設立的，建議妹妹打聽一下有關情形，考慮轉到和信去。妹妹問過後告訴我，和信醫院在關渡，距離家太遠，不方便，母親仍想請醫院再研究一下父親的特殊情況，希望能繼續住在萬芳醫院。

十月十日國慶日，也是我的生日，幾十年來，無論在新聞界或外交界工作，我都在參加國慶日酒會後與家人再找個餐廳慶生，民國六十八年及七十八年這兩年，內人還特別約了幾位朋友來為我慶祝四十歲及五十歲生日。這一次，我照常在布達佩斯最有名的 Gundel 餐廳主持代表處的國慶酒會，前一天內人問我，酒會結束後要不要再去吃碗麵過生日。我說今年免了，父親病重在醫院裡，我沒有心情過生日。

第二天凌晨，我就接到妹妹的電話說，父親已經走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父親真體諒我們，會選時間。他如果早幾天走，正遇上我須留在匈牙利處理公事，不能立即返國奔喪，晚幾天走，我們就要面臨被醫

院請出院的難題。

父親過世以後，有些朋友安慰我說，父親高壽八十八，福壽全歸，是有福之人。客觀地看，也確是如此。而且，回顧父親的一生，覺得他應該感到滿足，我也應該對他的成就感到敬佩。

如果單從履歷來看，父親在新聞界最高做到《中華日報》副總編輯，其後應淡江大學所有人張建邦先生之聘擔任教授，講授新聞。而我在新聞界濫竽充數近三十年，竟然做到中央社總編輯，後來又轉到外交部擔任發言人及駐外代表。我擔任中央社總編輯後，有一次父親對我說：「從前新聞界的人只知道冷若水是冷楓的兒子，現在大家只知道冷楓是冷若水的父親。」我從他說這句話的口氣，感得到他心中的委屈。

雖然我擔任過的職位高於父親，但是，從父親的學歷以及他就業的過程看，他的事業成就比我大多了。在很多地方，我都不如父親。

父親的一生，可說得上充滿了血淚。首先，父親的姓名根本不是冷楓，原名錢森聲，籍貫也不是身分證上寫的杭州市，應該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祖父錢叔和在那裡經營中藥鋪，為小康之家。父親從小天資聰穎，祖父把他送到杭州去念杭州高級中學，這是父親所受過最高的正式教育，許多年後，他被選送到政治大學前身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為期只有六個月，嚴格地說不能算是大學教育。

父親雖然只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但回到硤石後卻成為當地的高級知識分子。他也有知識分子的抱負，一面在當地小學教國文，一面跟幾位朋友集資辦一個刊物來議論時事。誰知第一期就得罪了當地政府，要以叛亂之罪名逮捕父親，幸好父親提前得到風聲，連夜離家出走，逃到上海，從此隱姓埋名，改名冷楓，籍貫也改為杭州，沿用了六十餘年。

父親的這段經歷，在我懂事以後曾聽父親簡單談起，他主要是讓我知道本姓，至於細節他就不願多談。只有一次，他提到一位我們兩人都認識的行政院新聞局官員，對我說，這就是當時在家鄉奉命要逮捕他的

人。我問父親此人是否知道你的原來身分，父親說應該知道，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願再提了。其實，我現在想一想，父親當時被地方政府下令逮捕，應該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以他當時的年齡與經歷，絕對不可能組織什麼叛亂活動，應該只是當地政府官員不喜歡他的文章，濫用職權強加罪名而已。在那個政治欠修明的時代，父親的遭遇應該不是獨一無二，多少青年人因此被誣陷，毀了前程，甚至喪生。我慶幸，也感謝父親並沒有因受此遭遇而變得憤世嫉俗。

父親因逃避追捕，從家鄉隻身到了上海後，舉目無親，又不敢隨便求職，只能在街頭流落，慢慢隨身攜帶的錢用完了，只好忍受飢餓，接連三天三夜沒有進食，暈倒在街頭，最後被人救起來送到難民收容所去。父親後來對我說，當他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給他食物時，因為三天未進食，食道僵硬，第一口食物竟然咽不下去。

到了難民收容所，管理人員發現他受過高中教育，就讓他留在所裡擔任國文教師，才算安定下來，生活恢復正常①。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後，政府宣布對日抗戰，全國青年掀起參加抗日陣營的風潮。父親時年二十出頭，血氣方剛，自然充滿抗日情緒，跟其他的年輕人一樣想尋找參加抗日的機會，此時共產黨利用青年人的愛國情緒，在各大城市招兵買馬，號稱在延安舉辦了抗日大學，以此引誘青年參加共產黨。父親和大多數的年輕人都不知道這個抗日大學的真相，只為「抗日」這兩個字所吸引，就與十幾位朋友組織起來，集體想從上海前往延安。臨出發前一天，朋友介紹了兩位女青年也要參加，其中一位名叫錢立英，就是後來我的母親。

這個團體從上海出發，搭乘火車往西走，先到了漢口，原想休息一陣，因日本軍隊已將打來，急忙搭船再走，到了長江邊時，船隻不能再行，只好步行到宜昌，父親在兵站臨時找到個文書工作，獲授上士，做了二十多天，再坐船到重慶。

父親他們這一團自上海出發時的目的地本來是延安，但是抵達重慶以後，看到了一個青年服務站，就去報到，受到安置，就此定居下來。妙的是，這個青年服務站是國民黨的陳立夫先生主持的，父親因此也就加入了國民黨，六十年來始終忠貞不二，連最後臨終前還堅持只看《中央日報》。

父親這一段從上海到四川的故事，是民國九十年元月我最後一次陪他過農曆新年時他才告訴我的，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慶幸命運的安排。因為如果他照原先的計畫到延安參加了共產黨，那麼今天的我就絕不會是現在的我。想到這裡，我不但感謝命運的安排，更感謝陳立夫先生無意中把我父親從加入共產黨的邊緣拉了回來。相信當時跟我父親同樣情況的青年一定不少，陳立夫先生不但救了我父親，也應該救了許多其他青年。

青年服務站把父親介紹到《血路周刊》工作，受到周刊主持人陶百川先生的賞識，獲推薦到中央政治學校新聞事業專修班受訓，結訓後被分發到成都的國風通訊社工作，隨後，父親又應聘到四川省圖書審查處擔任科長，直到抗戰勝利。

邀請父親到圖書審查處工作的是一位名叫陳克成的長輩，父親稱他老師，但是究竟是什麼時候，哪裡的老師，父親沒告訴過我，我也從沒有機會問過，我為了寫這篇紀念文問母親，他也說不知道。但這位長輩對父親一定十分賞識，從成都起就一直把父親帶在身邊，抗戰勝利後，他獲任為江蘇省崇明縣縣長，就把父親帶去擔任縣政府教育科長，後來他被任命為南京市政府新聞處長，又把父親帶去。可惜這位長輩有芙蓉之癖，在南京時還曾一度在鴉片館裡被警察突檢時發現，影響以後事業前途。

民國三十七年國共內戰南京情勢緊急時，父親就辭去新聞處的工作，轉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我在父親的遺物中找到一張民國三十八